

# 从《清明上河图》看中国传统城市经济

唐晔, 耿菲遥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 河北 保定 071002

**摘要:** 北宋都城东京是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城市发展的顶峰, 亦是中国传统型都市的典型代表。《清明上河图》以现实主义风格真实地反映了东京风貌特点。东京无论在城市规模还是在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方面都远高于同时代的西方城市, 造成这一差异的深层次原因是东西方城市经济发展路径的不同。中国传统城市一般是先发展为政治中心, 其后所拥有的资源从政治扩展至经济、文化领域, 从而又成为经济中心; 而西方城市则多由市场经济带动, 进而发育成政治中心。发育路径的差异使得西方城市具有先天的反封建性, 这是中国传统城市所不具备的, 也是中西方社会发展方向产生的重大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 《清明上河图》; 传统城市; 城市文明; 商品经济

**中图分类号:** K244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2186/2025.01.005

**文章编号:** 2096-9864(2025)01-0033-06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期, 历来为史学界所推崇, 其中又以日本京都学派为最。20世纪初,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宋代“近世说”, 认为唐宋时期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可以说“唐代是中世的结束, 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 这就是著名的“唐宋变革论”的核心观点<sup>[1]16</sup>; 在此基础上宫崎市定又进一步论证了宋代中国“近世说”, 明确提出, 同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欧一样, 宋代是中国“近世”(近代)的开端: “把这一时期(即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的社会状态与宋元明清进行对比, 将之同称为近世,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sup>[2]11</sup> 有欧美学者也认同日本京都学派这一观点。例如,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认为宋代是中国的“近代早期”, 宋代包括

了许多近代城市文明的特征, 所以在这一意义上可视其为近代早期。尽管中国大陆学界对宋代“近世说”持审慎态度, 但对宋代的历史地位鲜有异议。例如, 陈寅恪曾指出,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 造极于赵宋之世”<sup>[3]</sup>; 邓广铭同样指出, 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而言, 宋代在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空前绝后<sup>[4]</sup>; 而漆侠亦曾评价道: “特别是在两宋统治的三百年中, 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居于世界的最前列, 是当时最为先进、最为文明的国家。”<sup>[5]</sup>

高度发达的社会背后必然有高度繁荣的社会经济做支撑。对于宋代经济, 学界更是不吝赞誉, 在史学家们眼里宋代经济发生了“农业革命”“煤铁革命”“商业革命”“金融革命”“城

收稿日期: 2024-12-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1BZS058)

作者简介: 唐晔(1975—), 男, 河北省保定市人, 河北大学研究员,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经济史、社会史; 耿菲遥(2001—), 女, 辽宁省盘锦市人, 河北大学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经济史。

市革命”等各种革命。用美国著名史学家万志英的话来说就是“在日本和西方,或许也在中国,宋代经济革命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历史长时段叙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认为,宋代经济革命是一个根本性分水岭……”<sup>[6]</sup>。对于宋代经济成就,现有研究成果以分析传统传世文本文献为主,而本文则用更直观、更形象的画本作为分析的基础史料,以对宋代经济变革做一个补充性证明。

风俗画作为中国传统绘画中的一个流派,其以写实的手法描绘生活中各种习俗场景,这种现实主义风格使得它有很好的史学价值。中国风俗画起源于秦汉,成熟于宋代。宋代诞生了一批历史上著名的风俗画家与画作,其中张择端和他的名作《清明上河图》就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本文拟以《清明上河图》为基本史料,对宋代城市经济及其历史意义做一解读,丰富夯实宋代经济成就研究的史料和基础。

## 一、以运河为中心的全国性大市场:开放型商业经济

《清明上河图》中的“上河”一词是开封一带俗语,意为去或到汴河;而“清明”则是宋人传统外出踏青游玩的节日,《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正是东京(今开封)民众清明去汴河踏青郊游的盛景<sup>①</sup>。在五米多长的画卷上,张择端采用工笔手法对北宋都城开封从郊野到闹市做了全景式描绘。

汴河与城中的闹市是《清明上河图》的核心部分。在这一部分中,东京的繁华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图中游人如织,商贾云集,店铺连栋,车水马龙。东京当时人口过百万,在当时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大都市,而它之所以能够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以汴河为中心的漕运系统。

这也是张择端将汴河码头作为画作最核心的区域而占用全卷4/9的篇幅的原因。《宋史》载:“今天下甲卒数十万众,战马数十万匹,并萃京师,悉集七亡国之士民于辇下,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旬服时有水旱,不至艰歉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咸会天邑,舳舻相接,贍给公私,所以无匮乏。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sup>[7]</sup>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曾说“宋代可以说是以运河为中心的经济时代”<sup>[2]<sup>24</sup></sup>。宋廷为将全国物资运往开封,以隋唐运河体系为基础,进行一系列改造整治,运输能力大增,形成以开封为中心的运河系统。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上文中所言“惠民、金水、五丈、汴水四渠”,而其中又以汴河最为重要。汴河即原隋代通济渠,唐代改称广济渠,宋称汴河。宋人孟元老说:“汴河自西京洛口分水入京城,东去至泗州入淮,运东南之粮。凡东南方物,自此入京城,公私仰给焉。”<sup>[8]<sup>27</sup></sup>而实际上由运河入京的远不止东南物资。北宋漕运大致可以分四路,其中三路经汴河入京:两淮与东南六路物资由江南入淮水,再入汴水至东京;陕西物资由三门峡转黄河,入汴水再达东京;陕、蔡物资则由惠民河转蔡河再入汴水达东京;京东一带物资则由五丈河达东京。

运河系统不仅是政府物资运输的动脉,亦是当时最为重要的市场网络核心。宋代经历市场革命,商品经济勃兴,形成了以开封为中心的全国性大市场。图中汴河里几十条大小船只与汴河两岸遍布货物堆垛与民间摊贩,正是宋代市场经济繁荣的真实写照。

虹桥之后便是城中闹市区,这也是图中世人最为关注的地方。唐代诗圣杜甫曾惊叹商丘城市之繁华:“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舟车

<sup>①</sup>有少数学者认为《清明上河图》中的“清明”是政治清明之义,或是汴京清明坊之意。

半天下,主安多欢娱”,而宋代东京城中人口超过百万,何止九万家!画中的东京城宏伟大气,城墙连绵不绝,城内建筑鳞次栉比,宫殿巍峨壮观,街道宽广,店铺密布,游人如织,“置身流水游龙间,但少尘土扑面耳”,北宋开国以来的城市发展新气象尽收眼底。

尽管图中描绘的闹市仅是东京城东南一角,但依旧能充分地显示中国传统城市经济的面貌。图中,繁华的闹市中有各种商户几十家,除米店、肉店、医药店、绸缎铺、茶馆、作坊、旅馆、香铺等门面店铺外,更有不少流动性的货郎和摊贩沿街叫卖,令人目不暇接。无论是街市正道还是小径,随处可见规模不一的酒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东京开封酒家已经开始流行悬挂招牌。“今都城与郡县酒务,及凡鬻酒之肆,皆揭大帘于外,以青白布数幅为之。”<sup>[9]</sup>《清明上河图》中共有八幢明确挂有酒旗的酒楼,内配有色彩缤纷的各种挂饰,以及酒桶、酒壶、长柄舀酒器、酒埕等专业器具;酒楼的建筑设计尤其精美,大多数酒楼门面正对大街,甚至“街名也用酒楼来命名,这种情况是宋代才有的现象”<sup>[10]</sup>。除酒楼外,图中四十五幢用于经营的楼宇中,属于茶铺、饮食店的占一半以上,“坊巷院落,纵横万数,莫知纪极,处处拥门。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sup>[8]111-112</sup>,相关人物约一百三十人,占全图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七左右<sup>[11]98</sup>。这些人高低档次差距明显,为适应不同的消费需求,不同酒楼、餐店的观感差距同样巨大,如图中既有享有盛名的“孙羊正店”,属于包含贵宾厅和专有厢房的三层高级大酒楼;也有路边随处可见的经营品种繁多的茶食店,主要制作馄饨类面食与快餐等,不难看出其中落座的客人大多为城市里的劳动者或者漕运上的工人。除高档茶馆外,也不乏小摊出售面向中下层民众百姓的“饮子”<sup>[12]</sup>。开放型的商业经营也是北宋城市经济发展的鲜明特征。

图中还描绘了香料店、医馆、衣料铺、金银珠宝交易处、书店、杂货铺等,在内城形成了九条专业街。与以往朝代不同的是,这些商业街的建筑形态发生了质的改变,商业街模式代替了原有的固定市场模式,路沿更具层次感,商业态势也远为丰富<sup>[13]</sup>,甚至逐步自然生成了一种具备多样性的、用以人们交流交往的公共空间<sup>[14]</sup>,共同构成了北宋晚期东京城的空前盛况。

## 二、自由的商业空间:空前的经济活跃度

城市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标志之一,亦是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古代社会城市大多是政治型城市,为了更好服务政治统治,尽管这些政治中心一般也会发展成为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但这些功能都依附于其政治职能。中国早期传统城市设计都遵循这一理念,按照礼制与统治秩序设置城市格局。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王官门阿之制五雉,官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官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城制。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sup>[15]</sup>。

这种政治型城市的典型代表就是唐代的长安,其宫城、内朝、中朝、外朝层次分明、秩序井然,城市路网也按照《考工记》的等级规律筹措,市民与商业活动均受到官府严格控制,这就是著名的“坊市制”<sup>[11]43-44</sup>。

相比前朝,宋代城市格局则在经济革命的推动下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的坊市制度与城郭分隔城乡的作用已然消逝<sup>[16]</sup>。坊市制度基本要求是坊、市必须分离,独立管理,即市内不

住家,坊内不设店肆。市必须有“阨”即围墙,四面设门,称“阨”。市场朝开夕闭,交易聚散有时。例如,唐代规定:“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sup>[17]</sup>;政府设立市官(如司市、贾正、市令),市内商铺摊贩排列位置、商品定等计价均由市官管理监督。里坊亦有严格管理制度。坊要求有围墙、栅门以封闭街区,居民要依士农工商四等身份分区居住,即所谓“四民异居”。同时,城市中还有严格宵禁制度,即在入夜之后,坊门关闭,所有居民都禁止出门上街,否则即为“犯夜”。

坊市制显然是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较低时期朝廷为更便利维护统治而创设的制度。中唐以后,随着经济发展与政府控制能力衰退,坊市制度不断松弛,城市中“侵街”建房、坊内开店等现象屡屡出现。入宋以后,随着“市场革命”的推进,坊市与宵禁制度已完全不能适应现实。在开国初年宋廷也曾考虑过恢复坊市制度。例如,至道元年(995),宋太宗“诏参知政事张洎,改撰京城内外坊名八十余。由是分定布列,始有雍洛之制”<sup>[18]825</sup>;咸平五年(1002),谢德权上书建议置立“禁鼓昏晓,皆复长安旧制”<sup>[18]1110</sup>,但统治者的主观意愿无法阻挡时代的步伐,坊市制度还是被商业经济浪潮无情摧垮。在北宋中期后,坊、市已完全融合在一起,成了全新的街市。白居易曾在《登观音台望城》中描绘的“千百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市景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各种被铺面房廊侵占的杂乱而又充满烟火气息的街区。由于居民不断侵街,宋廷不断出台诏令拆除“违建”,“诏开封府毁撤京城民舍之侵街者”,但在现实利益面前,行政命令显得苍白无力。最终,朝廷不得已用征收“侵街房廊钱”默认了这一事实。《清明上河图》就真实地反映了北宋晚期开封的“侵街”热潮:虹桥几无宽松处,街道被居民与摊贩占满,甚至还出现了街道上“惊马撞人”的事件,可

见公共空间的充分利用,甚至称得上拥挤。

伴随坊市制度崩溃的还有宵禁制度。北宋中期名臣宋敏求叹曰:“二纪以来,不闻街鼓之声,金吾之职废矣。”<sup>[19]</sup>而及至南宋,人们甚至已经不知道“街鼓”为何物,“京都街鼓今尚废,后生读唐诗文及街鼓者,往往茫然不能知”<sup>[20]</sup>。东京城内满布勾栏瓦舍,市民无论什么阶层,只要有钱,都可以厕身其间,“终日居此,不觉抵暮”<sup>[21]145</sup>,“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sup>[21]462</sup>,“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阗如此”<sup>[21]176</sup>。

坊市制度与宵禁制度的废除不仅显示出宋代市场经济活跃,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拓宽了市民的人身自由。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曾指出,宋代结束了贵族时代,进入平民的时代<sup>[1]10</sup>,坊市制度与宵禁制度的消解无疑为这一论断提供了很好的注解。

### 三、传统经济中心:商业需求与分工细化

东京城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规模远超世界同时代其他城市。学界一般认为,到北宋末期东京城的总人口在150万人左右<sup>[22]</sup>,这在前工业时代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曾地跨欧亚非的阿拉伯帝国的首都巴格达在公元10世纪达到人口最高峰,据估计也达到过150万人<sup>[23]</sup>,但随着伊朗、突厥的大肆进攻,城内人口剧减,有学者估计巴格达人口只剩下30万~50万<sup>[11]223</sup>;而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在极盛之时人口则只有40万~50万<sup>[24]</sup>,随后遭遇的查士丁尼瘟疫(公元541—542年地中海世界暴发的第一次大规模鼠疫)使大量人口死亡,据统计,君士坦丁堡人口损失过半<sup>[25]</sup>,之后东罗马帝国一蹶不振;而大致同一时期的日本平安京,人口也不过数十万<sup>[26]</sup>;至于西欧,情况更差。自从西罗马灭亡,西欧进入中世纪封建时

代,封建领主们住进城堡,大城市即已不在。即便到了中世纪晚期乃至文艺复兴时代,随着商品经济发展,人口规模出现较大增长,学界认为7—12世纪,欧洲总体人口增长了3倍左右<sup>[27]</sup>,但城市规模依旧很小,即便到了文艺复兴之后,也远未达到北宋东京的人口规模。例如,14—15世纪,英国伦敦只有8万~10万人,整个英国人口在4万以上的城市不过4个<sup>[28]</sup>。法国人口比英国略多,尤其在经过13世纪的增长和恢复后,巴黎在13—15世纪成了欧洲最大的城市,1328年大致有家庭61 098户,人口20余万<sup>[29]</sup>。意大利则是人口高速扩张的代表,佛罗伦萨的人口从11世纪的1万余人,在12—13世纪增长到了大约10万人,佛城也因此跻身于欧洲五大城市之一<sup>[30]</sup>。总之,尽管欧洲在中世纪晚期受惠于农业的高速发展与长途贩运的兴起人口得以增长,但仍然处于一个被极端封建体制控制下的状态,大多数地区较为割裂,城市规模严重受限且人口流通受到管制。再之后的政教之争与大规模瘟疫又给了初始的欧洲人口增长重重一击。截止到中世纪结束,欧洲几个重要的城市人口规模也不足北宋东京的十分之一。

人口与城市规模无疑是体现一个社会发展程度最重要的指标。因为城市人口大都是从农业人口中分离出来的富余劳动力,城市规模越大,说明这个社会农业生产水平越高;同时城市人口越多,说明工商业规模越大,分工越细,生产水平也越高。从这个角度来看,北宋无疑代表着它那个时代人类文明的最高水平。

当然在肯定北宋社会发展水平的同时,也必须指出,城市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与其类型或者说发展路径也有很大关系。所谓政治型或经济型城市差异是指在其形成之初,它究竟先是政治中心还是经济中心。中国传统城市大多是政治型城市,而西欧城市多属经济型城市。相对于西方,中国传统社会政府权力要大很多。

中国传统社会奉行的理念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就是说政府几乎拥有一切权力与资源。中国传统社会政府可以动用政治力量,人为大量从农业人口中剥离出人口聚集于城市。北宋定都东京之后,就意味着东京注定成为超大规模城市。它人口的基础是依靠财政供养的规模庞大的官僚集团与驻军,以及服务于他们的工商服务业者。如此大规模的人口必然会带动经济与文化发展,从而必然也会形成经济中心。同时代的西欧社会则是另一种模式。如上文所言,西罗马灭亡过程中,城市被摧毁殆尽。中世纪中后期,西欧商品经济开始复苏,逐渐在一些交通便利的路口、江河交汇处形成集市,进而演化成市镇。最初,这些集市或者市镇受附近领主保护,但随着规模越来越大,市镇开始组建自己的“警备队”和管理机构,自治力量越来越强,进而更加能吸引周边农奴逃亡过来扩大自身规模。而它们繁荣的经济还会把从前的领主们从城堡里吸引过来,最终它们也会成为政治中心。这些城市的形成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模型下的城市发展过程,即随着农业、手工业等旧有行业生产力水平提高,逐渐会有剩余劳动力产生并分离出来,同时生产力提高还会形成新的社会需求,二者结合起来就会形成新的产业与行业,如此这般社会分工不断扩大,农业中分离出来的人口聚集逐渐形成城市。从这层意义上讲,西欧城市在形成之初就是与封建领主统治的广大农村地区相对立的,它是封建制度与文化异己力量的诞生地和大本营,而且最终必将成为封建制度的“掘墓人”。这也是以东京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城市所不能的。

#### 参考文献:

- [1] 内藤湖南. 概括的唐宋时代观[M]//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 黄约瑟,张学

- 锋,译.北京:中华书局,1992.
- [2] 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M].张学锋,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 [3]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M]//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277.
- [4] 邓广铭.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J].社会科学战线,1986(2):137-144.
- [5] 漆侠.宋代经济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9:8.
- [6] 万志英.《繁荣与衰退:中国市场经济(1000~1500年)》书评[M]//刘光临.繁荣与衰退:中国市场经济(1000~1500年).李春圆,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606.
- [7] 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2321.
- [8]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注[M].邓之诚,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 [9] 洪迈.容斋续笔[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471.
- [10] 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M].吴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274-277.
- [11] 薛凤旋.清明上河图:北宋繁华记忆[M].北京:中华书局,2017.
- [12] 周宝珠.释《清明上河图》中的“饮子”[J].中原文物,1996(1):97-99.
- [13] 朱金,潘嘉虹,朱晓峰.北宋东京城市商业空间发展特征研究:基于对《清明上河图》的解读[J].城市规划,2013,37(5):47-53.
- [14] 张晓鹏,申建红,郑钧,等.《清明上河图》中的城市空间格局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16,23(1):13-16.
- [15] 周礼[M].徐正英,常佩雨,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990,998.
- [16] 梁庚尧.南宋城市的发展[M]//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上卷.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481-583.
- [17] 李林甫,等.唐六典[M].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543-544.
- [18]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2.
- [19] 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上[M].诚刚,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11.
- [20]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十[M].杨立英,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213.
- [21]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笺注[M].伊永文,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 [22] 陈振.十一世纪前后的开封[J].中州学刊,1982(1):129-136,152.
- [23] 孙培良.中世纪的巴格达[J].世界历史,1980(1):42-54.
- [24]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33.
- [25] 刘榕榕,董晓佳.试论“查士丁尼瘟疫”对拜占廷帝国人口的影响[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9(2):158-161.
- [26] 释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卷四[M].武汉:崇文书局,2022:97.
- [27] 奇波拉.欧洲经济史:卷一[M].徐璇,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28.
- [28] 徐浩.中世纪英国城市人口估算[J].史学集刊,2015(1):27-39.
- [29] CROSSLEY-HOLLAND N. Living and dining in medieval Paris: The household of a fourteenth century knight [M]. Wales: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1996:61.
- [30] 达根.剑桥意大利史[M].邵嘉骏,沈慧慧,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43.

[责任编辑:侯圣伟]



引用格式:唐晔,耿菲遥.从《清明上河图》看中国传统城市经济[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6(1):33-38.